

文化
中国
与世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强世功 著

中国香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主 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中 国 香 港

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香港：政治与文化的视野 / 强世功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3295-9

I. 中… II. 强… III. 政治制度—研究—香港
IV. D67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44409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12.125

字 数 166 千字

印 数 0,001 — 7,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

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这套新编“文化：中国与世界”论丛，仍然承继这种从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的视野。我们以为，这种文明论的立场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因为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将消解所有历史文明之间的差异，绝不意味着走向无分殊的全球一体化文明，恰恰相反，全球化的过程实际更加突出了不同人民的“文明属性”。正是在全球化加速的时候，有关文明、文化、民族、族群等的讨论日益成为全球各地最突出的共同话题，既有所谓“文明冲突论”的出场，更有种种“文明对话论”的主张。而晚近以来“软实力”概念的普遍流行，更使世界各国都已日益明确地把文明潜力和文化创造力置于发展战略的核心。说到底，真正的大国崛起，必然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只有具备深厚文明潜力的国家才有作为大国崛起的资格和条件。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今日中国学术文化之现状无疑仍离这个期盼甚远，但我们不必妄自菲薄，而应看到这个预言的理据所在。这个理据就是张光直所说中国文

明积累了一笔最庞大的文化本钱，如他引用 Arthur Wright 的话所言：“全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二千五百年的正史里所记录下来的个别事件的总额是无法计算的。要将二十五史翻成英文，需要四千五百万个单词，而这还只代表那整个记录中的一小部分。”按张光直的看法，这笔庞大的文化资本，尚未被现代中国人好好利用过，因为近百年来的中国人基本是用西方一时一地的理论和观点去看世界，甚至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的理论观点都具有普遍性。但是，一旦“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倒转过来以中国文明的历史视野去看世界，那么中国文明积累的这笔庞大文化资本就会发挥出其巨大潜力。

诚如张光直先生所言，要把中国文明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我们需要同时做三件事，一是深入研究中国文明，二是尽量了解学习世界史，三是深入了解各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知所辨别。做这些工作都需要长时间，深功夫，需要每人从具体问题着手，同时又要求打破专业的壁垒而形成张光直提倡的“不是专业而是通业”的研究格局。这套丛书即希望能朝这种“通业研究”的方向做些努力。我们希望这里的每种书能以较小的篇幅来展开一些有意义的新观

念、新思想、新问题，同时丛书作为整体则能打破学科专业的篱笆，沟通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着重在问题意识上共同体现“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西方，重新认识古典，重新认识现代”的努力。

之所以要强调“重新认识”，是因为我们以往形成的对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据这种对西方的看法而又反过来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有许多都有必要加以重新检讨，其中有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而且流传极广，但事实上却未必正确甚至根本错误。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就美术而言，上世纪初康有为、陈独秀提倡的“美术革命”曾对 20 世纪的中国美术发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们把西方美术归结为“写实主义”，并据此认为中国传统美术因为不能“写实”已经死亡，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

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

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

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 年中秋于杭州

目 录

- 一 “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_____ 1
- 二 无言的幽怨_____ 25
- 三 九龙城寨与香港大学_____ 49
- 四 帝国的技艺_____ 70
- 五 在大陆思考海洋_____ 96
- 六 主权：王道与霸道之间_____ 121
- 七 “一国两制”的历史源流_____ 147
- 八 “一国”之谜：Country vs. State _____ 177
- 九 “一国”之谜：中国vs. 帝国_____ 203
- 十 基本法的形式与实质_____ 237
- 十一 退场：从循序渐进到激进革命_____ 272
- 十二 较量：政治与法律之间_____ 300
- 十三 中国的忧郁_____ 334

- 后记_____ 367

一 “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

1

关于港英时期香港的政治体制，有各种各样的概括。比如目前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称之为“仁慈独裁制”，这种体制形成了“隔离的官僚政治形态”；港大的英定国教授（G. B. Endecott）称之为“咨询性政府”，夏利斯教授（Peter Harris）则称之为“无政党的行政国家”；中大的金耀基教授称之为“行政吸纳政治”，而关信基教授则干脆称之为“非政治化的政治体制”。在这些不同的概括中，最有影响的恐怕要数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政治”之说。这个概括不仅影响了后来许多人对港英政治体制的认识，而且影响到对大陆政治体制的认识，比如康晓光先生就用“行政

吸纳政治”来解读中国的政治体制运作，这无疑是一场美丽的误会。

金耀基教授是华人世界中卓有声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正因为他对中国社会发展脉络有着准确的把握，他对中国政治也自然有独到的理解。他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一书就是作为其《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姊妹篇出版的。从这两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得出先生用心良苦：即在学术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在政治上试图从政治与社会两个途径来重建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文明。这样的构思反映在他对《中国政治与文化》这本论文集的精心编排中。这本书的前三篇论述香港的政治体制及其转型，第四篇讲中国知识分子与大陆政治的演变，接下来两篇讲台湾政治体制的转型，然后再讲儒学与亚洲的民主问题，最后一篇则直接冠名“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建构”。从两岸三地到亚洲、再到世界，实际上讲传统中国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并由此重建中国文明秩序。在这样的总体思路中，“行政吸纳政治”作为对港英政治体制的概括，反过来更能说明香港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宪政框架下，香港的“政治”（可简单地理解为民主参与诉求）才有了根本性的发展。这样一种对香港政治的理解与关信

基教授提出的“非政治化的政治体制”之说，有着同样的现实关怀。

一旦意识到金先生的理论诉求和政治关怀，我们就要对“行政吸纳政治”之说给予特别的关注。首先要考虑的是，“行政吸纳政治”所说的“行政”是什么，“政治”又是什么。尽管金先生并没有给出完整的定义，但通观全文，他所说的“行政”是指政府管理体制，而“政治”就是指大众（尤其是社会精英）的民主参与。如果说现代政治体制是基于代议制的大众民主参与体制，那么港英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成功地压制了代议制民主的发展，同时通过开放行政管理体制的方式把大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吸纳进行政系统中来。因此，“行政吸纳政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或政治安排，它成功地解决了西方政治理论关于民主政治从市民社会发达的大都市中产生的香港困境（即香港是一个市民社会高度发达的大都市，但却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正是基于上述思考，金先生在文中系统地梳理了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吸纳社会精英参与政治的情况、公务员体系向华人精英开放的情况，以及市政局和地方社区吸纳草根阶层的情况等等。

“行政吸纳政治”之说的确把握住了港英政治体制

的精髓，但如果我们追问这种政治体制何以成为可能，就会发现这一解释模式将港英政府一百多年来漫长的政治演变压缩到一个平面的并列叙述中，仿佛这些“吸纳”是在同时发生的。可事实上，这些不同的“吸纳”是因应不同历史阶段的特殊政治要求产生的。比如对草根阶层的广泛吸纳是在1960—70年代出现的；对公务员系统的吸纳是从二战后开始的；而对街坊会之类社区组织的吸纳，基本上从184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下来。如果省略掉这些历史演变，就看不到这种不同的“吸纳”背后所隐藏的“政治”，而这个“政治”实际上是“行政”吸纳不了的。换句话说，这种非历史化的社会学描述，实际上将“行政吸纳政治”做了相应的“去政治化”处理。

问题是，当金先生把立法局、行政局、公务员体系、市政局等港英政府独特的体制统统称为“行政”时，不仅忽略了这些部门与港英香港政治体制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港英政府的“政治”到哪里去了？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就是“政治”统领“行政”，如果说“政治”被“行政”所吸纳的话，这个“行政”又由谁来统领呢？“行政吸纳政治”这个动宾结构句式缺少了一个主语。我们只有把这个主语找出

来，才能把真正的政治问题揭示出来。

其实，人们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于港督的殖民统治，这个政治是“行政”无法吸纳的。由此，行政所要吸纳的“政治”一定是与港督的统治截然不同的政治。如果港督统领下的行政不能吸纳这种政治的话，那就成了彻底的独裁殖民政治，正因为吸纳了这种政治，才变成了刘兆佳教授所谓的“仁慈独裁”。由此可见，金先生所说的行政要吸纳的“政治”，绝不是韦伯所谓的支配或统治的政治，而是“参与政治”或“咨询政治”。而在支配政治与参与政治这两种不同政治类型的划分背后，实质上隐藏着英国人与中国人关于香港主权的根本分歧。香港政治的殖民地性质就在于英国人的支配政治吸纳了中国人的参与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教授英定国的“咨询性政府”其实更准确地揭示了港英政治体制的实质，即英国人在咨询中国人之后行使统治。

由此，“行政吸纳政治”的准确表述应当是“港督（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中国人的）政治参与”。英国人是主语，中国人不过是宾语前的修饰语。“英国才是香港真正的‘主权者’，香港人既不能、也没有必要关心自己的政治。尽管极少数华人富商巨贾和权势人物有

可能幸运地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华人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沦为纯粹‘经济的动物’。所谓‘行政吸纳政治’不过是说，政治在香港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管理，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政’ (economy)。”^{〔1〕}而要理解这一点，就要理解香港的总督体制。离开港督来谈论香港的政治体制，所看到的不过是没有灵魂的僵尸，就像离开主权和支配问题谈论政治，看到的多数不过是表象。因此，要理解真正金先生所说的“行政吸纳政治”，就需要理解体现大英帝国治理艺术的“总督制”，以及港英时期围绕香港统治权展开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斗争。

2

迈因纳斯教授 (Norman Miners) 曾把港英的政治制度看作是“早期帝国政治的活化石”^{〔2〕}，因为港英的政治制度从 1840 年以来经历了一百多年几乎保持不

〔1〕 吴增定：《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二十一世纪》，2002 年，第 12 期。

〔2〕 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伍修珊等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第 1 页。